



張浩

沉重的翅膀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广大读者熟悉的女作家张洁的新作。写的是当前的重大题材——我们的工业怎样才能搞上去？作品没有常见的枯燥无味地写生产过程，和诸如废寝忘食攻克尖端之类的情节，而是着力在塑造人，揭示人的心灵。她写了部长、司局长、厂长、车间主任、秘书、青年工人、女记者以及他们的家庭、子女。她提出了办工业中人的价值和作用，如何把行为科学应用到企业管理中。

作品中的人物个性鲜明，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社会人。有理想、有魄力、为工业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郑子云副部长，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，也会有妥协、迁就；在家庭生活中，也会有忧伤与不幸。“风派”部长田守诚的老谋深算、青年一代的向往追求，写来各有千秋，动人心魄。作品揭露了体制改革中种种尖锐的问题，有力地抨击了因循守旧的势力和陈腐的道德观念等等。正是这些束缚着有志改革现状的人们，走向理想的未来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。但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，有志者正奋力鼓起沉重的翅膀向前飞翔！

《沉重的翅膀》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仍然保持她特有的风格。对读者来说，这部作品既有艺术欣赏价值，又提出了许多耐人思索的问题。

沉重的翅膀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6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8,000

书号 10019·3226 定价 0.92元

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
兴而忘我工作的人。

作 者

写在前面

人生是什么？

有朋友说：“人生是苦中作乐。”

“不！”我说，“人生是和命运不息止的搏斗。”

让我们从这个普通人的，这句朴素的话里，得到超度吧。——实践，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，从厨房里飘送过来。案板上，还响着切菜刀的轻快的节奏。

也许是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，叶知秋的心情就象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朗的天空。这一刹那，她竟觉得自己好象恢复了学生时代那么贪吃的胃口，一口气可以吃得下五两千饭。这种难以寻觅的旧时情怀，引起她的一种渴望，使她肆意要干一件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、学生时代的恶作剧才好。

唉，当然不能胡闹，她毕竟是一个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人了。况且，即使在自己的家里，她也不能太过地放肆，因为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成为一种习惯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，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，那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。即使她是这样地注意检点自己，在别人的眼睛里，她也将是一个行为荒诞，哪怕每天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，却会因为心不在焉的一个小小的疏忽，弄得人家怀恨在心的、不合时宜的人物。天知道！她不过是一个最简单的人，简单得象一个只有第一信号系统的低级动物一样。而人们的认

识，经过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陶冶，越是复杂的现象、越是谎言，倒越是显得正常，容易让人相信，容易让人理解。而越是简单的、越是真话，反倒显得不正常、不容易让人相信、不容易让人理解了。白白地活了四十几年，却还没有学会生活！冷静的时候，她好象也很明白自己的欠缺，等到激动起来，却仍然是浑然一片。

于是，她勉强着把自己这种快乐的冲动，压进一个中年的、中华民族的妇女所应该具有的风度的模式里去。也许因为她的压力还不很足，那冲动“啞”的一下又冒出来了一点，她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，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中午吃什么？”

莫征立刻在厨房里用法文接了上来：“红菜汤、腊肠和面包。”

这孩子真不赖，竟然没有忘记。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自小在那个有教养的家庭里所受到的训练。

有教养的家庭?!——可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，就象她自己一样。

是的，莫征曾经有过一个温暖的、有教养的家庭。

可教养又是什么呢？在那几年，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，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。

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，为什么要创造物质文明呢？要是都停留在洪荒时代，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，那么，一切大概都会简单得多。

莫征的父母，曾是一所名牌大学里的法文教授。五十年代中期，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。那时，莫征只有三岁多。长

得非常可爱，很象英国电影《雾都孤儿》里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尔，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，黑黑的眼珠，象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。每次开饭以前，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，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，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妈妈：“我可以吃饭了吗？”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的时候，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。当时，叶知秋绝没有想到，他以后的命运，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。为这，叶知秋总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莫征，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，不然，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？

问题还不只是他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，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。残酷的生活，使他失去了本应该是他所有的，却增添了许多不应当强加于他的。父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双双死于非命之后，他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，象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。当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来之后，他甚至也狠狠地咬了她一口，在她家里等于来了一次卷逃。这也许是一条野狗才会有的惨痛的经验，因为无数次的事实证明，每一只向它伸过去的手，几乎都是痛打它的手，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有一只想要抚慰它的手。从来没吃过糖的人，怎么能够想象“甜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。她也理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，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？这痛苦象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这个孩子联在了一起。

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她这一生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，

她象一切女人一样，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女人的天性的机会。

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再没有比丑陋这件事更使她伤心的了。真的，那真是一种不幸。

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每一个部件，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，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。

那些很代表她的性格的头发，又粗、又多、又硬。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板，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，稍稍地削薄一点。于是，又短，又厚的头发，每一根都象放射线似地向四外支楞着，远远看去，活象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。

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。肩膀方方正正，就象伐木人用斧子砍倒一棵老树后的树桩——是砍倒而不是用锯锯倒的。

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，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的。

最坚强的心，也许是最脆弱的心。对于在各种逆境中，备受作践、蹂躏、摧残……从而变得残酷、冷漠的心灵来说，再没有比“温暖”这种东西更强大、更能征服他的力量了，它甚至超过原子弹、氢弹。因为他得到的太少、失去的太多，一旦得到，就很懂得珍惜。何况叶知秋给莫征的，决不只是一点点温暖，而是真正的、象母亲一样的爱。这两个被许多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们视为不可理喻的人，充分地享受着那些或许是正常的家庭享受不到的天伦之乐。

菜饭端进来了。

莫征，象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，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，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。两个盘子上还摆着一个小小的盛果酱的盘子。

腊肠切得很薄，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向，顺着盘子绕成环形，斜躺在盘底。面包切得很均匀，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，简直象用尺子比着、量着切出来的。

每每看着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以及他带着一种看不出来的、又猜不透含义的微笑，象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，有意地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，叶知秋的心里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——只是淡淡的。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。比如，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，如果没有莫征，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。奇怪，食堂里烧的东西，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，永远是一个味儿，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，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，就算下了狠心抽出时间，她也不会做。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……不，生存能力！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，不过她也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样毫不相干的联想。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却是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，别管是做饭、弹钢琴、或是法文……他当然比她强得多！可是他为什么这样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？不，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，她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……而是什么呢？她的思绪飘移开去……

汤大概很烫，放到桌子上之后，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

头尖。

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。手指粗而长，手掌厚而宽，指关节和挠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。她知道，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。小小的人儿，脚还够不着踏板，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……可现在，就是叶知秋心血来潮地，在他们家里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，用僵硬的、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，他呢，却远远地躲进他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里，仿佛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……

什么叫做应该是呢？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。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，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。衣服皱皱巴巴，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了，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，大小不一。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，象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，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，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上的三角口子。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，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，整天和树枝、灌木丛打交道，灌水、剪枝、喷药……一不小心，就会被树枝刮破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——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——方方的下巴，棱角清晰的大嘴巴，黑而柔软的头发从中间分开，松松地披向脑后，仿佛修剪过的、那么不宽不窄的眉毛，整齐地、直直地伸向太阳穴，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，微微地往上翘着，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，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。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人稍大了一些，目光总显得凝重、迟缓，还有点儿淡漠。而这效果完全不同的眉毛和眼睛，给他造就了一个不能不引人注意的面孔。

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，在那因为开榫已经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，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，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。

一听见这声音，叶知秋总是不放心。她已经说过多少次，要么赶快拿出去修理，要么就丢掉它，不然，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的。而莫征总是不以为然地、懒懒地说：“没事儿，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！”其实，他倒并不是懒，在他看来，摔一跤又算得什么了不起的、值得担心的呢？叶知秋只好随他。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，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地对那凳子瞟上几眼。这会儿，她的眼睛也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。虽然是不动声色的，莫征也还是感觉到了。唉，太过于操心了。

然后，他仿佛是不经心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吧？”

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，匆匆地呷了一口，笑了，满意地称许着：“不错，挺地道，象你的法文发音一样的地道。”

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系的回忆呢？莫征决不愿意去回想它。可为什么只要有一点点光亮，它立刻就会象影子一样出现，紧紧地跟着他，纠缠着他，不肯和他分离。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。其实，这烦恼也是多余的。他张开嘴巴，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，咽下了那勺菜汤，好象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了肚子里去。适才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好象安定下来。接着，用自己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。

“哐当”一声。叶知秋一愣，一时以为莫征到底是翻倒了凳子。不，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来的。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。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、嚓嚓地响着的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压抑着的啜泣声。

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，说道：“高尔基笔下的人物的生活。”

叶知秋停下了吃饭。

莫征，还是带着那淡淡的、冷冷的微笑：“怎么啦？”

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、不易动情的莫征的面前，她觉得自己有时倒象个幼稚的、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别人的哭声里，我咽不下饭去……”

“您简直象个基督教徒。”

她发气了：“莫征！”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。然后站起身来，往外走去。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，那弓着的腿，活象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：“您还是歇会儿吧！您管得了吗？过不了两天还得打。”

他说的是真话。楼上这一家，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。那两口子都不是那种泼皮式的人物，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，可是，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沉重啊！

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：“您还是再吃点吧，一会儿该凉了！”

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，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她摇摇头。

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，顺手翻动着这些天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报纸。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竣工投产、哪

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的报道……是的，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。还有一个多月，七九年就要过去了。她立即想起她病前就要急着写完的那篇报道，开始寻找她已经写好的那份提纲。

奇怪，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？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！没有！也许放在抽屉里了？

她依次拉开一个又一个抽屉，每个抽屉都是一样的混乱：日记本、信札、邮票、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、工作证、眼镜盒（有好几个）、药瓶子（空的或是装着药的）……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，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。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这种耐心的人，所以每当她急急地在这里面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，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这些东西，没用的就把它扔掉，这里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：这些旧信，瞧，还有这个空药瓶子。“砰”的一声，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。

可是，等到这阵骚乱一过，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，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。再说，那些旧信虽然都不是什么亲朋故旧寄来的，但她依然舍不得丢掉。它们好象是她的生活的记录：失败的，然而却是昂扬的。

因为她是记者，又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命运的不公平待遇的人的那种由衷的同情，对一切丑恶的现象的义愤——在那些年这种事情是那样地遍及每个角落，在她采访过的那些平凡的工人、基层干部中间，她简直就象个可以以心相托的朋友。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！那些事情，照例地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，每每她象个没头苍蝇，乱碰

一气，精疲力竭地回来，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，她总是感到内疚，好象她也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，不过，他们并没有认为她是个不可信托的人。难呐！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降临；站在门口，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，羞涩地微笑着，微微地涨红了脸，然后，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。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象个客店。

这两年，信件的色彩有了明显的转变：谁谁家的，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；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，恢复了工作；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，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撤了职……这些信，怎么舍得丢掉呢？

但是，提纲总得找到！

“莫征，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？”她知道她用不着说什么提纲不提纲的，那对找到或找不到是完全没有一点帮助的。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是不大以为然，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的。

“什么纸？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！”

“一张稿纸，上面写了字的！”

莫征这才想了起来：“噢——前天小壮来玩儿，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！”

叶知秋真正地痛心了：“哎呀呀！那是我准备写的一篇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报道提纲，怎么是废纸！”

“我怎么知道什么提纲不提纲。”语调里竟没有一点不安或歉意。

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写过字的纸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

动！你全当成耳旁风！”

莫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。倒不是他已经觉悟到自己撕掉了一篇提纲，而是因为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面孔和语调里那种懊丧的情绪。便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改：“其实，有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，急什么呢？那些报道什么的，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官话！有人看吗？又有人信吗？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。我看你脑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越来越多了。”叶知秋拍桌子了。

莫征不再说话。他不愿意惹叶知秋生气。于是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。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，以及莫征那轻轻地、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。

他们经常发生争论，但往往让步的，却是莫征。他不愿意惹她生气。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，竟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荫，因为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着的、给他温暖的、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。也还因为他有一种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优越感。

有时他不能理解，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，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，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。简直莫名其妙！难道他们那一代全是这个样子吗？差不多！唉，他们那一代，是多么善良、多么轻信、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一代啊！

这种争论，也常使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，她觉得她终究还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。她的思想是新鲜的，感觉是敏锐的。她并不陈腐。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。在他们的眼睛里，大半凡是有了年纪的人，都是

老朽的。

自从五六年大学毕业以后，她已经在新闻战线工作了二十多年。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，对真实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一点、深一点。她早就对许多发生过的事物有她自己的看法，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，但是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，叶知秋哟，你不管报道什么，千万不要有半点虚伪，可不能愚弄了养活我们的人民。就拿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些年来说，她宁肯耍赖不写，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。她明白，这绝不是因为她勇敢，而恰恰是因为她幸好不是搞理论的。相反，她是懦弱的。但这能怪她吗？那是整整一个懦弱的时期。

她接触过不少战斗在工业第一线上的基层的同志。那都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。那些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干巴巴的数字，在她眼睛里都是一张张熟悉的脸、出炉的钢水、转动的机床、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路……每每想起这些，她总是感到安慰，毕竟还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干着。她因此而觉得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，是值得她忠诚地献出一切的工作。可是，听听莫征在说什么？

现在，她愈想愈气，连下巴都有点哆嗦，伸出长长的脖子，拿眼睛瞪着莫征，连她的眼镜也好象发了脾气，恨不得从鼻梁上跳下来，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。

这下莫征不吃了，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。她误解了他的意思。他收起了脸上那种淡漠的冷冷的笑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说：“我不是说您的工作，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。好些人都会以为那些个数字，是从基层到上面，一级一级按着

统计表格的要求，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一个算盘子儿、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。其实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，就连‘最高指示’在内。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，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。扯淡！有什么意思。我也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，我是说它没有意思。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，他们家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应该有人写一篇这样的文章：这许多年来，这些流汗出力的、脚踏实地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财富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的真实报道。这样的报道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工业生产发展了没有，发展得怎么样。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？您想过没有？！”这回，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，他越说越快，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盆往前一推。菜汤洒了出来，向四周漾开，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，淌了莫征一裤腿。他掏出揉成一团的、已经脏得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，擦着湿了的裤腿。不停地，一下又一下……那动作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，那不过是在发泄着他极力压抑着的情绪。

莫征的话，象在她那憋足了气的心口上安了一个减压阀，使里面的压力渐渐地降了下来。他说的话，虽然带着孩子气的偏激，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。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错误、失败。如果不是这么来回折腾，老百姓的生活总会稍好一些吧？但总之，无论如何比解放以前好得多了。

她不大有力地说：“这些数字至少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，比起解放前……”